

红军长征期间,曾在贵州转战5个月零8天,革命活动遍及当时全省68个县(市)。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、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民族的社会结构,红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革命思想、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支持、团结爱国民主人士、尊重关爱宗教人士,壮大了革命力量、传播了革命火种、保存了红军实力,为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,为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长征途中的贵州统战故事

□ 赵蕾

1 “弄染结盟”

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签定的首个政治盟约

1934年12月,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后,毛泽东嘱咐红军战士,必须与各民族建立亲密的关系,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。1935年1月后,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,在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》等文件、文告中强调“不论汉族、苗族、布依族;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,都一律平等”“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”“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”,对于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“在生活上、政治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”“在人数较多时,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,并特别注意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”。

1935年4月,中央红军四渡赤水,南渡乌江、佯攻贵阳、直插云南,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,进入安顺的民族地区。其中,进入六马一带的是红三军团,由彭德怀任军团长,杨尚昆任政委。



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。

红三军团计划横渡北盘江,快速转战云南,争取更多时间寻求战机,六马地区的弄染寨是通过北盘江渡口的必经之路,由布依族领袖陆瑞光带领的地方武装控制,寨中有200多户、千余人。陆瑞光爱憎分明,仗义疏财,凡是起义反抗军阀官府的农民首领,都愿意与他合作。以陆瑞光为首,卢云奇、曾云清和王禹先被称为镇守、关岭和紫云等具有名的“四大天王”,一旦需要,陆瑞光可在短时间内招集几百上千人的队伍。

为尽快通过六马地区,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、政委杨尚昆来到弄染寨会见陆瑞光,向他介绍党的民族政策,揭露反动军阀的罪恶统治。陆瑞光曾听说红军英勇善战,纪律严明,还善待百姓,他发现,红军首长待人亲切诚恳,红军部队纪律严明,进寨后全坐在院坝里,一律没有进入民房。在打消顾虑后,陆瑞光安排杀猪宰羊,热情接待并促膝长谈。陆瑞光诉说了当地各族群众所遭受的苦难,彭德怀及杨尚昆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和革命道理,告诉他警惕反动派阴谋,加强民族团结。红军的政治主张和陆瑞光心中的理想图景不谋而合。

1935年4月16日,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、杨尚昆、李富春与陆瑞光在弄染寨签订“反蒋作战协定”,史称“弄染结盟”,这是红军长征中与地方少数民族签订的第一个政治盟约,也是红军“争取少数民族”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。

关于陆瑞光与红军结盟一事,中央档案馆还保留着当年彭德怀、杨尚昆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。内容如下:“军委:……沙子沟周围百数里,有夷(布依)兵约千,有师团营组织,一首领名陆瑞光,我们已与其订立协定:反蒋(介石)、王(家烈)、犹(国材)国民党及苛捐杂税。留有一批伤病员,赠步枪廿六支,并留有一批工作人员。……彭、杨。1935年4月16日17时30分。”《彭德怀年谱》亦有记载:“沙子沟周围数百里有少数民族武装千余人,有师、团、营组织,并订有作战协定,他们反对国民党军及苛

捐杂税,我军赠送给他们26支枪,并留一批工作人员开展该地工作。”

1935年4月17日清晨,红三军团离开弄染寨向云南疾进,陆瑞光号召全寨村民尽量提供补给,带着几十名部下亲自护送到乐纪坡顶,并赠送大米、布匹、川盐、鸡蛋、草药等物资。

肖华将军回忆,“弄染结盟”使得红军快速顺利通过该地区,安全渡过了北盘江。正是由于红军争取了陆瑞光等人的合作,为红军争取了进军云南、抢渡金沙江的战机,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牺牲。

通过“弄染结盟”,陆瑞光的身份从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首领转变成了革命者,他带领各族群众同党和红军生死与共,结成了反抗反动军阀的命运共同体。1936年底,四川军阀杨森率军进入贵州,并在安顺驻防。杨森以“迎接红军过境和签订‘反蒋协定’”的罪名逮捕陆瑞光,随后诱捕卢云奇、曾云清和王禹先。

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,陆瑞光大义凛然,威武不屈。1937年春,杨森将陆瑞光等“四大天王”杀害于贵阳市八角岩,陆瑞光牺牲时年仅36岁。各族群众为怀念陆瑞光,曾作一副楹联:“紫云缭绕龙腾飞瑞光三千里,白水澎湃击马奔天祥一万年。”

红军在贵州民族地区播撒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,当地布依族群众在中共党员傅以平、陈汉民带领下,掀起“六马暴动”,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。1947年,成立“六马人民反蒋游击队”,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安顺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1989年,贵州省人民政府追授陆瑞光为革命烈士。

2 周素园

随红军长征的辛亥革命元老

1936年1月,红二、六军团渡过乌江天险,攻占黔西、大定、毕节。“进城之初,有的基层干部不明情况,看到一座古旧宅院,料想是地主之家,便带人进去‘打土豪’,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,书上密圈细点,说明都经书的主人仔细读过。他们奇怪了:‘地主还读马列?’便把情况向上汇报,我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。他就是周素园。”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为《周素园文集》所作的序中回忆。

周素园是“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,黔省第一报人和新思想的播火者”。他1879年出生于贵州毕节,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,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、参议院秘书。

在问及读这些书和留下来的原因时,周素园答道:“我相信马克思主义。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,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,你们共产党、红军,是讲马克思主义的,所以我用不着走……”

之后,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,邀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。周素园曾写信给滇军上层的龙云、孙渡、鲁道元等人,希望他们不要与北上抗日的红军为敌。红六军团团长萧克曾回忆:“周素园给孙渡写信,很有说服力。孙渡在威宁、昭通按兵不动,固然出于利害考虑,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。这种态势,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,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,休整补充。”

为了壮大革命力量,周素园协助红军发动组织群众,短短10多天,在毕节、大定、黔西建立乡农会30多个,扩充红军5000余人。

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,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。任弼时、贺龙和萧克等人认为,周素园已57岁,身体病弱,跟随红军远征,一路枪林弹雨,恐怕吃不消,但又不宜留在毕节,准备送他去香港治病,给党做统战工作。周素园坚定地表示:“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,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。现在参加了红军,才找到了光明。我周素园就是死,也要死在红军里头!”贺龙深为感动:“好啊!有骨气,我佩服,我就赞成这样的人,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,我也要抬着他长征。我们就同患难,生死与共!”

1936年3月10日,周素园随红六军团四处转战,开始了历时9个多月、艰险而光荣的长征之路。他渡过金沙江天险,翻越四座大雪山、穿越原始森林、过草地时因断粮靠啃草根度日,年近花甲、身着长衫的周素园自然是长征

途中一道特殊风景。

当时,周素园见到李宗仁发动“两广事变”的通电,以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名义,撰写并由红军电台广播《对李宗仁元电广播稿》,批判了蒋介石的反动政策,希望李宗仁等能与红军合作,共同抗日反蒋。周素园奉命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,在过草地时,贺龙专门让警卫员跑远路,为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和青稞饼。

1936年12月2日,红六军团到达陕北保安(今志丹县),周素园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接见和亲切长谈。毛主席曾多次写信并看望周素园,称赞他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,却是正式红军。

周素园在《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——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》中说:“我们从严寒绝境中走出,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我衣,推食食我,有房子让我们驻扎,有敌人给我们掩护。一种阶级友爱,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。”

在延安时,周素园的足疾复发,生活几乎不能自理。贺龙、萧克十分关心,让他们的夫人蹇先任、蹇先佛常去看望周素园,帮他缝补浆洗。周素园很是内疚,觉得自己成了“坐享优待”的累赘,于是动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做统战工作的念头,并将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。毛泽东给他回信:

素园老先生:

示敬悉。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,并不觉得你是“坐享优待”。先生的行止与工作,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、兴趣来决定,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,不比年轻人。这一点,不但我们应顾到,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。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,康健更有保证些,工作才会更好些。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,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,我是全部同意的。路费拟赠300元,不知够不够,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。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,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,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。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,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。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,并告我。何时走,我来看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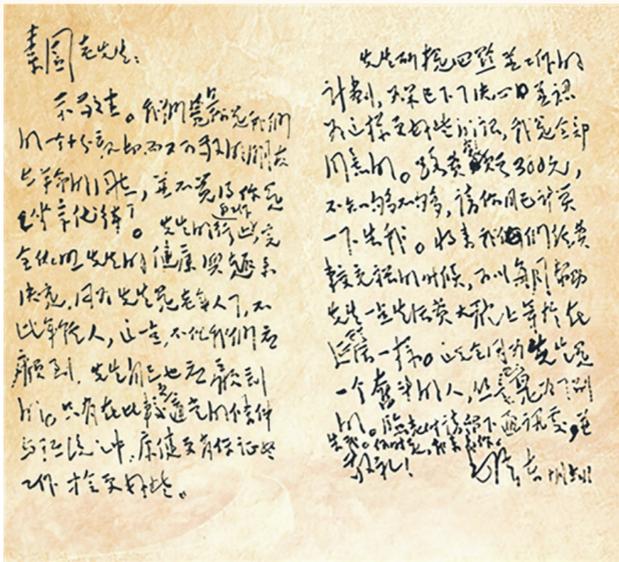
敬礼!

毛泽东 十月六日

毛泽东信中周素园关怀备至,周素园非常感动。

1937年10月23日,周素园携毛泽东、朱德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离开延安。在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贵阳等地以八路军高级参议身份广泛开展活动,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,在他的影响下,代理四川省主席邓汉祥向延安汇支法币四万元,补助陕北公学经费。他受到云南龙云和其他上层人士欢迎,介绍朱家骅等一批西南进步青年赴延安学习,还为八路军募得急需的药品,运往抗战前方。周素园这些革命活动,受到云贵当局警告,被迫回家乡“养病”,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艰苦度过11个年头。

解放前夕,人民解放军二野向大西南进军,周素园不顾年迈虚弱之身,担任毕节县和毕节专区支前委员会主任,为人民解放军筹措



毛泽东给周素园的亲笔信。

入川粮秣,写信争取在黔国民党将领刘鹤鸣、罗湘培等起义,专员廖兴序,县长吴庭芳、谢德光等亦相继投诚。贵州解放后,人民政府将周素园接到贵阳,任命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、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。

1951年10月,周素园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,朱德、周恩来和萧克等老朋友接见了。令周素园最为激动的,是11月3日下午两点,毛泽东单独接见并与其亲切交谈40分钟,结束后,毛泽东送他一匣海南岛特产燕窝,亲自送他至大门口外院并目送他上车。

1954年,周素园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1955年担任贵州省副省长,并担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。

1958年2月,周素园病逝于贵阳,享年79岁。

3 《神灵之手》

外国传教士勃沙特出版的首部红军长征著作

1934年10月1日,红六军团在黄平旧州返回镇远的路上,与一位外国传教士不期而遇。当时,中共中央发出命令:所经之处一律取消外国传教士及传教活动,严查以传教士为名义进行间谍活动的外国人。因此,红六军团扣留了这位叫勃沙特的瑞士传教士。

勃沙特戏剧性地卷入红军长征队伍,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,转战川、鄂、湘、黔、滇,1936年4月11日,在红二、六军团即将北上川康时,红军决定释放勃沙特,至此,他随红军长征已18个月。

1936年8月,勃沙特在昆明写完《神灵之手》一书,并于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。他以亲历者的视角告诉人们:“实际上,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,并在实践其原理,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。”《神灵之手》比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早一年出版,是首部向西方披露红军长征的著作。

书中反映了红二、六军团长征中的诸多重要事件,1934年10月2日,红六军团袭占旧州后,在教堂找到一张外文贵州省地图。军团长萧克请勃沙特担任翻译。勃沙特写道:“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,这时代年(仅25岁(应为27岁)的萧克将军把我叫去,请我为他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省地图。他相当热情、开朗,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,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。”

萧克回忆道:“时隔多年,我之所以念念不忘,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。当时,我们在贵州转战,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,32开本,只能看看省会、县城、大市镇的大概位置,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,没有战术上的价值。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,勃沙特帮助译成中文,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

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,同时,他在边译边聊中,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,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。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。”

在描述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和纪律严明时,勃沙特由衷赞叹:“他们的确不畏艰苦,不知疲倦。”“看到他们那惊人的斗志和毅力,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万千。”在勃沙特眼里,红军队伍纪律严明,在随红军躲避空袭隐蔽到果林中时,他说:“树上柑子满枝,因未查明是地主还是老百姓的,红军命令不许摘。”

在谈起红军政治思想教育特色时,勃沙特写道:“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红军战士是多么勤奋。在这里,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;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,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,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。”“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常常围绕着我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,在那些油印的出版物中,不乏对事物认识的真知灼见。”

勃沙特称赞红军帮助贫苦群众:“红军对穷人很好,在艰苦的征途中,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们。”“我们来到一个土豪家宿营。这里的一切,马上成了红军的财富,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。然后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。”

在讲述红军的人道主义时,勃沙特道:“开始时,卫兵推我拉我,打破行军队列帮助我,这样我好不容易才没掉队。”“后来,他们带着两个人和一副担架告诉我,只要我走不动,他们就抬我。”到了宿营地,“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,加了些白糖。”艰苦环境中,勃沙特时常患病。红军请来中医为他治疗;“卫兵拿着他给我开的药方抓来了药,用药罐熬成浓汁,让我服用。”红军还总是尽其所能对勃沙特的伙食住宿给予照顾,条件允许时,他能享受每天四个鸡蛋或四分之一磅肉的特殊伙食标准。

勃沙特感慨:“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认识了共产主义,并随着时间而逐步加深。”

1936年4月11日,在云南富民县,萧克亲自告诉勃沙特被释放的消息:“你是瑞士公民,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,没有不公平对待中国人,没有租界,我们决定给你自由。”红军还特意勃沙特开具通行证,以保障他可继续留在中国,萧克设宴为勃沙特饯行,亲自为他做自己的拿手菜粉蒸肉,还邀请周素园、王震等人作陪。王震和颜悦色地对勃沙特说:“当你向报纸介绍时,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,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,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穷人。”

后来,勃沙特仍在贵州的贵阳、盘县、遵义等地继续传教。1951年冬,勃沙特夫妇离开盘县到老挝传教,在巴色居住了15年。勃沙特的妻子去世后,他定居英国曼彻斯特,1993年去世,享年96岁。在勃沙特夫妇要离开中国时,他说: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。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,我不怕,因为我了解他们。只要共产党是我所见到的红军,就用不着害怕。他们是讲友谊的,是信得过的朋友。”正如勃沙特诗里所写:“我们患难与共,我们同勉负重。为那珍贵的互助,我洒下深情的泪珠。”

(作者系致公党贵州省委秘书长,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、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、贵州省人民政府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。)



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,勃沙特在云南富民离开红军。